评吴三桂从投清到反清

史　松

吴三桂作为一个反动封建军阀的一生，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：明末，他是驻守山海关外的总兵官，在明清战争中，拥有一定的军事、经济实力；投向清朝后，封平西王，任大将军，在镇压大顺、大西农民军，绞杀抗清力量的血腥战争中扩大了自己的权势；当他进入云南，消灭了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农民军，晋封亲王，专制两省，企图割据一方，成了清初最大的藩镇；年过六旬，又挑起反清战火，发动“三藩之乱”，自称皇帝，终于兵败身亡，结束了反动封建军阀的罪恶一生。本文就上述几个方面，谈些粗浅看法。

（一）

明朝末年，由于长期的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，在腐败的封建统治阶级中，形成了一批踞地拥兵、残民以逞的军阀集团。这些集团具有明末封建统治者的腐朽特点，利用手中的武装，掠夺财富，鱼肉人民，贪婪，残暴，荒淫，无耻。吴襄、吴三桂父子久驻山海关外，拥兵数万，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，和祖大寿集团结为姻戚，是有相当军事、经济实力的强镇。

1644年春天，因为全国政治、军事形势急剧变化，吴三桂集团的地位突出起来。这时，大河以北的明军主力几乎全被大顺军所消灭，关外的祖大寿等部已先后降清，大顺军挥师北上，势如破竹，胜利进入北京，明朝灭亡；清朝在克服了因皇太极去世而产生的继承危机之后，正秣马厉兵，准备兴兵入关，统一中原。吴三桂一军据守山海关，夹在清朝和大顺朝之间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
清朝和大顺双方都在争取吴三桂。清朝方面，早就几次通过其舅祖大寿及张存仁、祖可法等降将致书劝降，为了迫降，清军于1643年占领了吴三桂的老家中后所。大顺方面，也命其父吴襄作书，派降将唐通前往劝降，并发银犒军。吴三桂在大顺军入北京之前，奉明崇祯帝“弃关外地，入援京师”之命，“徙五十万众，日行数十里”，知京城已陷，回山海关驻守，大顺招降者亦至。经过几天的犹豫，吴三桂决定投向清朝，致书清摄政王多尔衮，“泣血求助”，请“合兵以抵都门，灭流寇于宫廷”。

许多史料都说到吴三桂本已决定归降大顺，只因得知爱姬陈园园被掠，才翻然改图，不顾其父及家属留在大顺政权手中，一怒起兵。吴梅村因有“痛哭六军皆缟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；“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”的著名诗句。陈园园事件，固然说明大顺军的领袖在进入北京后确实犯了许多错误，是吴三桂投清的导因，也表明吴三桂“为君父报仇”的虚伪。事实上，促使吴三桂投清的决定因素是他的阶级本性，是吴氏集团的封建政治经济利益。

吴三桂家族，作为封建军事官僚地主集团，本来是植根于朱明王朝的。崇祯朝廷用加“三饷”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喂肥了它。维护和不断扩大权势和财富，是吴三桂集团效忠朝廷的前提。封建时代的财富主要是土地，中后所被清军占领，吴氏集团的“老本”尽失；崇祯

帝放弃关外的旨意，使收复故土的希望不复存在。崇祯朝廷财政早已破产，当时欠吴军兵饷已达十四个月，军心已经不稳。因此，当大顺军兵临北京，君父危急，虽有朝廷“飞檄”，吴军在赴援时却是“被命迁延”，迟迟其行。显然，因为经济利益得不到保证，吴三桂集团对明朝的忠心已经动摇。即使明朝不被大顺所灭，吴三桂迟早也会步祖大寿的后尘，投向清朝。大顺军入北京，加速了事变的进程，为吴三桂提供了一个“冠冕堂皇”的借口。

应该看到吴军中三千子弟兵的作用。三千吴氏子弟，是吴军的骨干，据吴襄说，他们在关外都各自拥有值银数百两之田庄，平日食则“细酒肥羊”，衣则“纨罗纻绮”。祖大寿集团降清后受优待的情形，他们当早有所闻，明朝既不复存在，走祖氏集团的路，使产业能以恢复，富贵重新得到保证，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。这就是吴氏集团的军心。吴三桂以军事起家，懂得军心对于兵权的重要，他不能不按军心行事。

大顺的政策，也促使吴氏集团必然投清。大顺在北京四十天，基本上保持了农民政权的本色，其主要表现就是重申“割富济贫”和继续“追赃助饷”。这种打击锋芒十分明显的阶级政策，自然遭到京城内外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。北方封建势力只能从清朝寻求保护，找到新的靠山。吴三桂集团和冯铨、柳寅东等官僚迅速投向清朝，并积极参加征剿农民军，恢复和加强封建统治秩序，并非偶然，完全是当时阶级斗争的现实所决定的。

吴三桂投清，有一个幌子，叫“借兵讨贼，恢复明室”。他致书多尔衮，还是站在明朝立场说话，说是如能“合兵灭寇”，“则我朝之报北朝，岂唯财帛，将裂地以酬，不敢食言”。多尔衮不予理会，直率表示：“伯若率众来归，必封以故土，晋爵藩王”。看来，多尔衮军中深知吴三桂集团“军心”的人不少，这“封以故土，晋爵藩王”的许诺，就足以使吴三桂忘掉“本朝”，而向“北朝”俯首剃发称臣了。

清朝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方针是早就定了的，计划是先北后南，逐步推进。顺治元年四月初多尔衮出师的战略目标，是先取黄河以北，站稳脚跟后再解决南方。吴三桂的“来归”，很是及时。“讨贼复仇”的旗号也“名正言顺”，可以得到汉族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。这对于清朝较快地控制黄河以北，十分有利，所以对吴三桂不吝封以高爵。果然，山海关一战获胜，清军顺利入关。

（二）

清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，大量使用由降兵降将改编的绿营，以弥补八旗兵力的不足。对入京前即已投顺的，如吴三桂、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等，更是作为主力，封以王爵，派出专征。其中，吴三桂实力最强，① 作战凶猛，立功最多。在征战中，吴三桂的势力进一步膨胀，成为清初最大的军阀集团。

吴三桂投清后，因“故土”已复，富贵皆有保障，为了对清朝感恩报答，在复仇的名义下，凶狠地扑向大顺军。顺治元年四、五月间，吴三桂同大顺军激战于京郊、定州、真定。同年十月，清朝两路出师西征大顺，吴三桂军是主力之一。大顺军战败南撤，吴三桂同阿济格等从陕西一直追到湖广，武昌一战，大顺军损失惨重。顺治二年八月，阿济格等班师，吴三桂军回驻锦州故土，休整部队，整理庄园。

清朝对吴三桂并非没有戒心。顺治元年十月，当南明弘光政权使者至北京时，吴三桂虽然拒绝南明蓟国公封爵，但又遣人致意，说是对南明“终身不忍一矢相加遗”。顺治二年，他又捐银助修明崇祯帝陵，声言“何忍忘恩于故主”。这些表现，自然不会受到清朝统治者

的赞许。自顺治二年八月回驻锦州后，有三年时间，吴三桂被置而不用。而孔、尚、耿诸军，则从顺治三年起一直在湖南、广西同南明作战。后来，因姜壤起兵大同反清，山陕震动；在南方战场，降将金声桓、李成栋于南昌、广州起兵反清，军事形势大变，才不得不起用吴三桂，命其统兵入陕助战。到顺治八年，大西军成为抗清主力，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、敬谨亲王尼堪先后丧生，大西军李定国部“两蹶名王，天下震动”，刘文秀部挺进四川，形势对清朝很不利。这时，才命吴三桂专征四川，对付大西军。但同孔有德等南征军不同，吴三桂出师，有朝廷亲信、将军李国翰同往，实际上是监军。几年后李国翰死于军中，吴三桂才算摆脱了监视。这时，吴三桂通过大批纳降，军事实力迅速扩大，到顺治十七年，除了藩下官兵，吴三桂所辖的绿营兵达到六万人，而尚可喜部绿营兵只七千五百人，耿继茂部只七千人。

顺治十六年，清军三路兵入云南，消灭了南明王朝，实现了大陆的初步统一，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。在东南沿海，郑成功的抗清武装还相当强大。南明永历帝和大西军李定国部退入缅甸，在云南等地还有一定的潜势力。在川陕鄂交界地区，大顺军李来亨等部继续坚持斗争。清朝在军事上仍然需要悉心筹划，妥善部署，而云贵边陲，距京城遥远，八旗兵留驻诸多不便，出于无奈，只能同意洪承畴的建议，将八旗兵撤回，以吴三桂驻镇云南（同时，以尚可喜镇广东，耿继茂镇福建），并授予相应的权力。于是，吴三桂不仅拥有庞大的军事力量，还控制了广大的地盘。

清朝因出于不得已，是留有余地的。敕谕中说明云贵两省事务是“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”，“俟数年后该省大定，仍照旧令各官管理”。但吴三桂却开始作永久驻镇，长期独霸一方的准备。当时的云南并不稳定。新降附的大批官兵尚心怀疑虑。大西军经营云南十余年，与各少数民族关系甚好，许多土司首领都不愿接受吴三桂的统治，兴兵反抗者此伏彼起。永历帝和李定国一军的存在，更被吴三桂视为心腹之患。因此，和洪承畴先安定内部，暂缓兴兵入缅的主张不同，吴三桂积极准备武力根除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他向朝廷上“三患二难”之疏，② 危言耸听，力主进兵，并得到同意。顺治十八年冬，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擒处死，李定国随亦病亡，吴三桂达到了目的。朱由榔在就擒之前，致书吴三桂，责其忘恩负义，问他为何“提数十万众，穷追逆旅之身”？“岂天覆地载之中，独不容仆一人乎？抑封王锡爵之后，犹欲歼仆以邀功乎？”“将军既毁我室，又欲取我子，读《鸱鸮》之章，能不惨然心恻乎？”这些悲愤的问题，吴三桂当然无法回答。

永历既除，吴三桂确实又得到清朝的奖赏，被晋封为亲王，地位在尚可喜、耿继茂之上。地位既已巩固，就着手经营其独立王国。首先，取得朝廷同意，把明朝世镇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庄田全部转归吴氏集团，并以此为借口大肆霸占民间土地。除了同西藏开展贸易外，还“招徕商旅，资以藩本，使广通贸易，殖货财”。又垄断川省药材，“广征关市榷税、盐井、金矿、铜山之利，厚自封殖。”③ 吴三桂在自己的“封国”里建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。又大兴土木，搜集全国各地珍奇，供其享受。在旧永历宫殿基础上兴建的五华山王宫广袤达数十里，“卉木之奇，运自两粤，器玩之丽，购自八闽；而管弦锦绮以及书画之属，则必取之三吴，捆载不绝。”④

吴三桂还四处招揽人才，邀买人心，布党羽于全国。“择诸将子弟及四方宾客资性颖敏者，授以黄石素书、武侯阵法，以备将帅之选。”又常以王府批文任命官员，或朝廷已有任命亦必收回，号称“西选”，“西选之官几满天下”。⑤ 御史杨素蕴上疏表示“深为骇异”，

说：用人乃国家之大权，吴三桂“即从封疆起见，未必别有深心，然防微杜渐，当慎于机先。”建议朝廷予以申饬。但朝廷只能息事宁人。

吴三桂的骄恣跋扈逐渐明显，政治野心也日益增长，正是，“时吴三桂自以滇中形势南扼黔粤，西控秦陇；财用富饶，兵甲坚利；且治军严整，号令肃然，屯守攻战之宜无不必具，乃复伪为恭敬，虚伪延纳，由是将士乐为之用，民心亦翕然归附，强藩雄镇咸受其笼络，其不轨之志，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也。”⑥

（三）

顺康之际，清朝经过二十年的战争，初步实现了全国统一，但这种统一是很脆弱、很不巩固的。在征伐战争中壮大起来的军事集团，成为朝廷的新威胁，和破坏国家统一的主要隐患。云贵的吴氏集团，广东的尚氏集团，福建的耿氏集团，还有广西的孙延龄（掌管定南王藩下官兵），都是有地盘、有实力的藩镇。他们在自己的“封国”里专权自恣，地方官皆仰其鼻息，“藩下人”横行无忌，私税征遍全境，“藩商”布满天下，人民遭受着加倍的苦难。

供养这些藩镇，在财政上也是朝廷的沉重负担。当时，经长期战乱之后，人口大量减少，生产尚未恢复，各省人丁不过二千一百余万，全国财政收入不过银二千余万两。每年人不敷出达四百余万两，原因是军费开支十分浩大。仅云南一省，朝廷每年需从外省运去兵饷九百余万两。给事中王命岳说，这是“绝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”。左都御史王熙认为这种状况“势难经久”，他主张，云南的绿营官兵“亟宜裁汰”，平西王“藩下余丁”也应散遣屯种，使其“势分而饷亦裕”。王熙不仅从财政上，也从政治上着眼，提出对吴三桂这样威胁中央政权的强藩要使其“势分”的问题，是很有见地的。

吴三桂很清楚朝廷的疑虑和不满。他不会忘记，顺治十六年时朝廷并未完全采纳洪承畴“云南险远，请如元明故事，以王公坐镇”的主张，只是让他“暂管”。在京城，他有“散金钱，交通四方”的儿子吴应熊充当坐探，随时可以得知朝廷的动向。康熙六年五月，他声称因患目疾，请求朝廷“解两省兵务”，目的是为了试探。朝廷不仅立即表示同意，还决定取消吴三桂总管两省“各项事务”和题补大小文官的权力。吴三桂不甘心，唆使他的党羽，云贵总督卞三元、两省提督张国柱、李本深合词奏请“平西王吴三桂仍总管两省事务”。有旨不准。吴三桂大失所望，他看清了朝廷限制和削弱诸藩的决心，明白了“世镇云南”、割据称雄的野心为朝廷所绝对不许，他积极进行准备，等待着时机。

然而，要彻底解决南方诸藩，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多数宁愿用和平的方法。他们不愿使矛盾激化，对用武力解决没有信心。因此，常是姑息迁就，朝臣中有言诸潘不法事者，多被责罚。长期居住广西的知府傅弘烈密告吴三桂有逆谋，竟以诬告论死（康熙帝亲政后才减刑充军）。决心彻底解决南方诸藩的是康熙帝。他亲政以后，把诸藩问题的解决作为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三件大事之一。一方面等待时机，同时从多方面进行准备，包括：整顿财政以筹措经费，修整武备以提高八旗官兵的战斗力，采取一些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以争取民心，等等。为了避免矛盾过早激化，康熙帝还派吴应熊往云南省父，遣侍卫前往赐吴三桂以御用帽、裘，实行安抚。

到康熙十二年三月，平南王尚可喜疏请撤藩，归老辽东，随后，吴三桂、耿精忠为了试探，也在同年七月疏请撤藩。康熙帝鉴于“撤亦反，不撤亦反”的严峻现实，毅然决然地力排众议，批准撤藩。撤藩令下，“三藩之乱”开始，康熙帝因早有准备，就毫不慌乱地迅速

作出反应，亲自指挥平叛战争。

（四）

吴三桂的政治野心促使他走上发动反清叛乱的道路。叛乱和平叛的战争历时八年，吴三桂彻底失败。吴氏集团和南方诸藩的覆灭，使清朝的统治得到巩固，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，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。从明朝末年腐败的土壤中所孳生，在清初复杂条件下膨胀起来的毒瘤，终于被割除了。

割除毒瘤，并不容易。叛乱开始时，形势对清朝是十分险恶的。吴三桂靠战争起家，所部久经战阵，士马精强。他利用民族矛盾，打出反满兴汉，为明朝复仇的旗号，有一定的影响力。他蓄谋已久，突然发动，在军事上占了先着。康熙十二年十一月，当他自称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、周王”举兵反清后，吴军从贵州入湖南，直抵长江南岸，其党羽也于川、陕等地纷起响应。耿精忠在福建，孙延龄在广西，尚之信在广东，先后起兵反清。一二年间，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云、贵、粤、桂、闽、川、湘诸省已非朝廷所有，陕、甘、鄂、赣、皖、浙沦为两军鏖战的战场，朝廷所保有的仅直、鲁、豫、晋、苏数省和奉天地区。

经过几年的相持阶段，形势逐渐变得对朝廷有利。康熙帝用分化瓦解的办法，首先解决了耿精忠、尚之信等，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。到康熙十七年，吴三桂见败局已定，在衡州草率称帝，过了几天皇帝瘾，不久即病死。康熙二十年，清军攻入云南，吴氏集团覆灭，“三藩之乱”结束。

吴三桂失败的原因何在？

第一，吴三桂师出无名，他发动的是不得人心的分裂战争。尽管他起兵之初力图利用朱明王朝的残余影响来争取群众，又是改换衣冠，又是祭永历帝，演了一场闹剧，但这只能使人齿冷。清朝安远靖寇大将军、贝勒尚善曾致书吴三桂，驳斥他举兵的借口，说得很中肯。信中说：“今借口兴复明室，曩者大兵入关，不闻请立明裔，天下大定，犹为我计除后患，翦灭明宗，安在其为故主效忠哉！”

从明末至清初，民族战争与阶级战争交织，历时五十年。长期战乱，使全国人口损失大半。田地荒芜，千里丘墟。劫后余生的人民，渴望安定。自康熙三年起，战争基本结束，人民开始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。由于康熙帝的正确政策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已经得到缓和。吴三桂重新挑起战乱，各阶层群众都不会支持。江南一带在清初一直是群众性反清斗争高涨的地区，吴三桂反清后却一直保持稳定。北方各省，虽然承担着因战争而带来的种种重负，但人民群众仍然忍受下来，使清朝有一个巩固的后方。

第二，在实力对比上，吴三桂和整个南方诸藩都无法同朝廷抗衡。吴三桂经营云贵十余年，但当时的云贵，其人丁和财赋都不到全国的百分之一。整个南方诸藩控制区六省，人丁不过占全国百分之十三，而朝廷所控制的江南和北方诸省，人丁和财赋都占全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，吴三桂以云贵一隅之地，决不可能支持范围广大的长期战争。因此，吴军所到之处，极力压榨人民，百计搜括，所谓“军需孔殷，则加税田亩”，“征催严迫，怨声四起”。结果，只能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，加速了吴三桂集团的败亡。

第三，南方诸藩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阵营。耿、尚、孙等各有打算，他们反清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，继续割据一方称王称霸。他们并无推翻朝廷的大志，也不相信“兴复明室”的鬼话，更不愿接受什么“周王”的统治。当吴三桂自称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”时，耿精忠

也自封为“总统兵马大将军”，孙延龄则自称“安远大将军”，同吴三桂分庭抗礼；尚之信虽然接受吴三桂授与的“招讨大将军、辅德公”的封号，但也从来不接受调遣。

吴三桂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朝廷周旋。他的军事战略也不高明。兵抵长江，他停止不前，举棋不定，丧失了因为突然发动、迅速进兵而带来的主动权。战争变成了持久战、消耗战，使他从优势转为劣势。

在清朝方面，年仅二十的康熙帝掌握着平叛战争的领导权，其政治策略和军事指挥十分不凡。他的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的方针；他鉴于八旗武装不得力而大胆起用绿营将领的政策；他坚定地扼守长江、先在陕甘、浙闽取得胜利，后在湖南与吴军决战的军事部署；他对待反正来归者的宽大态度，和为及时了解军情所采取的措施；都对战争的结局起了重要作用。吴三桂曾以为，清朝开国宿将多已辞世，八旗武装已经腐败，康熙帝不过是幼长深宫，涉世未深的少年，他可以稳操胜券。但结果却是年轻的康熙帝打败了老行伍吴三桂，取得了平定“三藩”的重大胜利，使国家走向统一。

---

① 不算所属绿营，仅藩下官兵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均为十五佐领，而平西王吴三桂为五十三佐领。（见《平定三逆方略》）

② “三患二难”，是说南明永历帝和李定国不除，对于云南是“患在门户”，“患在肘腋”，“患在肤理”，而随时准备应敌，则“措饷”困难，招集流散人民“培养”困难。

③ 《吴耿尚孔四王合传》，《逆臣传》卷一。

④ 钮琇：《觚賸》。

⑤⑥ 《吴耿尚孔四王合传》。